

中国现代哲学史

资料汇编

遼寧大學
哲學院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 第二册）

问 题 和 主 义 论 战

主编 钟离蒙 杨凤麟

一九八一年七月 沈阳



目 录

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 (1)
“来了”	鲁 迅 (4)
问题与主义	知 非 (兰志先) (4)
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	陈独秀 (8)
主义与努力	陈独秀 (9)
主义与时代	力 子 (10)
论是非	寔 声 (11)
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 适 (13)
三论问题与主义	胡 适 (15)
四论问题与主义	胡 适 (19)
新思潮的意义	胡 适 (21)
职业自由的要求	张东荪 (25)
再与太朴论主义底选择	光 亮 (26)
“研究问题”	赤 (张申府) (27)
为谈主义者进一解	勉 人 (28)
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中共中央 (30)
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	《先驱》编辑部 (36)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政变的宣言並答复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 (37)
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 (39)
Bolshevism的胜利	李大钊 (40)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李大钊 (43)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	蔡和森 (45)
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	蔡和森 (47)
蔡元培的话不错吗?	代 英 (52)
前途的乐观	代 英 (54)
学术与救国	代 英 (56)
再论学术与救国	代 英 (58)
猪八戒小说	瞿秋白 (60)
胡适之与善后会议	双林 (瞿秋白) (61)
政治教育	中 夏 (63)
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	陈独秀 (63)
蔡元培的宣言	蔡元培 (66)
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	P · 生 (67)

革命与进化·····	成 阴 (69)
告研究自然科学者·····	伯 庄 (70)
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教育·····	超 麟 (72)
评胡适之的新花样·····	求 实 (74)
评胡适之《爱国运动与求学》·····	未 艾 (79)
实验主义·····	胡 适 (80)
我的歧路·····	胡 适 (101)
附录一王伯秋先生来信·····	(104)
附录二付斯棱先生来信·····	(104)
附录三答伯秋与付斯棱两先生·····	(105)
我们的政治主张·····	胡 适 (106)
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	胡适等 (108)
国际的中国·····	胡 适 (127)
我们还主张召集各省会议·····	胡 适 (129)
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	胡 适 (131)
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	胡 适 (132)
政治与社会·····	高一涵 (133)
我国的联帮问题·····	陈达材 (136)
评努力周报的政治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	公 敢 (139)
答复何公敢先生对于“我们政治主张”的批评·····	经 农 (144)
答朱经农先生·····	公 敢 (145)
评“联省自治”与“邦联”·····	公 敢 (148)
建造新中国的唯一的路·····	寿康 公敢 (151)

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迹，永久不能消减。从前信奉英国的Owen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Fourier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派与Fourier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象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Noyes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Owen主义者，又不是Fourier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俨然。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象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图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亲爱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假冒牌号的危险 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Bonar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的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鸚鵡、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扎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欧游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

政府党入造的。以后展转传说，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那里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辞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的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扬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辞，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议论事，简直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决 “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当，请赐指教。以后再谈吧。

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

1919年8月17日

（“每周评论”第35号）

“来了”

鲁 迅

近来时常听得人说，“过激主义来了”；报纸上也时常写着，“过激主义来了”。

于是有几文钱的人，很不高兴，官员也着忙，要防华工，要留心俄国人；连警察厅也向所属发出了严查“有无过激党设立机关”的公事。

着忙是无怪的，严查也无怪的，但先要问什么是过激主义呢？

这是他们没有说明，我也无从知道；——我虽然不知道，却敢说一句话：“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

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军国民主义么，我们何尝会同别人打仗，无抵抗主义么，我们却是主战参战的；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

所以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试举目前的例，便如陕西学界的布告，湖南灾民的布告，何等可怕，与比利时公布的德兵苛酷情形，俄国别党宣布的列宁政府残暴情形，比较起来，他们简直是太平天下了。德国还说是军国主义，列宁不消说还是过激主义哩！

这便是“来了”来了。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来的怎样也不可知。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甚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

可见大家都单怕“来了”，同我一样。那时还只有“多数主义”，没有“过激主义”哩。

（选自《鲁迅全集》二卷，〈热风〉随感录五十六）

问题与主义

兰 志 先

近日《每周评论》上，有一篇胡君适之的文章，劝人少讲主义，多研究问题，说得非常痛辟。吾们舆论界，从这篇文章里，得的益处一定不少。但是中国今日的思想界，混沌已极，是个“扶得东来西又倒”的东西。胡君这篇议论，恐怕会得一个意想外的结果。况且他的议论里头，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抹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现在记者且把自己的意见，分几层写出来，就正胡君，并质之一般舆论界。

现在请先一论问题的性质。

一、凡是构成一个问题，必定是社会生活上遇着了一种困难。这困难是从三种情形来的：（一）旧存的制度，和新有的理想冲突；（二）新变化的生活，（外来的或自发的原因，）和旧事物的冲突；（三）社会中有扰乱迫害的事实发生。因有这三种情形问题的性质，便有理想和现实的区别。其解决的方法，也就不能一律并论了。

二、问题本因实际利害而起。但是在这不等质的社会，各部分的利害，常不一致。甲部分的问题，未必不是乙部分的问题，甚或互相冲突，各自构成相反的问题。故问题的范围常不相同，有世界的问题，有一民族的问题，有一地方的或一阶级的问题。问题愈广，理想的分子亦愈多；问题愈狭，现实的色彩亦愈甚；决不可以一概而论的。

三、问题之发生，固起于困难；但构成一种问题，非必由于客观的事实，而全赖主观的反省。有主观的反省，虽小事亦可成为问题；无主观的反省，即遇着极不合理的，或是极困难的事实，也未必能成为问题。比如专制君主的毒害，在中国行了几千年，并没有人觉他不合理，拿来成一问题。及至最近数十年，西方的思想输入，人民有了比较，起了反省，即便成了极大的问题，产生出辛亥革命的大事件。又如东方的家族制度，奴隶劳动，在今日思想已经进步的时候，尚不能成为问题，若移到西方去，立刻便成了一种不可终日的问题了。可见构成问题的要素，全在这主观的反省。

问题的性质既是这样复杂，那解决的方法当然不能简单一样。遇着局部的现实的经过反省，成了问题的时候，自然用不着主义学说来说鼓吹，只要求具体的解决方法，便有结果。若是一种广泛的含有无数理想的分子的——即为尚未试验实行的方法，——问题，并且一般人民，对于他全无反省，尚不能成为问题的时候，恐怕具体的方法，也不过等于空谈，决没有什么效果可言的么！况且解决一种问题，全靠与这问题有关系的人自动的起来解决，方有效果可言。若是有关系的人无丝毫感觉这问题重要，即使人起来代劳，其效果不是零便是恶，是可断定的。故所以吾们要提出一种具体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必定先要鼓吹这问题的意义，以及理论上根据，引起了一般人的反省，使成了问题，才能采纳吾们的方法。否则问题尚不成，有什么方法可言呢？

通常提到问题两个字，一定把他当作具体的性质看；其实不尽然。哲学科学上的且不提，即如与吾们实际生活有关系的问题，抽象性质的也很多。……从他根本的方面着眼，即成了抽象性的问题，从他实行的方面着眼，便成了具体性的问题。……

象吾上文第一项所举的旧制度和新理想的冲突问题：这种问题，大概通常称为革命的问题（广义的）。初起的时候，一定是在那是非善恶的方面争，即标示的改革方法，也决不是什么具体方法，一定是一种趋向的标准。（这种标示，与其说是方法，毋宁说是目标。）比如法国大革命时候所标示的自由、平等，和中国辛亥革命所标示排满，算是具体的方法呢，还是理想的目标呢？这可以不言而喻的。故凡是革命的问题，一定从许多要求中，抽出几点共通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种抽象性的问题，才能发生效力。若是罗列许多具体方法，即就变成一种条陈，连问题都不成，如何能做一般的进行方针呢？于此可见问题不限于具体性，而抽象性的问题，更重要的了。

像吾上文第二项所举的例，凡是一阶级一地方的实际利害，自然是具体问题居多。但是涉于事物制度起源的问题，那就变成抽象了。比如选举权及自治权的问题，在起初的时候，决不是他内容如何的问题，一定是正当不正当及权利义务的理論问题。何况自一阶级以及他阶级，一地方以及他地方？若不是抽出共通点来作进行的标准，那人力车夫的利害问题，如

何能是小学教员的问题；小学教员的问题，又如何能算是女工的问题？其中能一致的地方，自然是抽象的结果了。“去其特别点而取其共通点。”若如民族的世界的问题，因他范围之广，那抽象性是自然越发增大的了。故问题的范围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于此更可见抽象性问题的重要了。

像吾上文所举的第三项的例，人类主观的反省，固多起于实际苦痛的压迫。但是人有一种习惯性，他的性质异常固定，可以使人麻木不仁。任你如何活动的物事，一成习惯，便如生铁铸成，决不能动他秋毫。古今无量数的人，为苦痛压迫的牺牲，因为这习惯的桎梏，宛转就死，尚不知其所以然，并没有人把他提出来做个问题。必定等到有少数天才有识的人，把他提作问题，加以种种理论上的鼓吹，然后才成一个共通的问题。故抽象问题，常在具体问题之先，到了第二步才变成具体的性质的。

从这三点看起来，问题不限于具体，抽象性的更为重要；而当问题初起之时，一定先为抽象性，后才变成具体性的。照此讲法，主义学说，如何可以说是不重要，而一笔抹杀呢？吾且再把主义学说的性质论一论。

主义是什么呢？胡君说，从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因为传播的缘故，才变成一种抽象的主义。（简略胡君原语）。这话果然不错。但有许多主义，他的重要部分，并不在从具体主张变成抽象名词，却在那未来的理想。世间有许多极有力量的主义，在他发生的时候，即为一种理想，并不是什么具体方法，信仰这主义的，也只是信仰他的理想，并不考究他的实行方法。即如从具体方法变成主义的，也决不是单依着抽象方法便能构成，尚须经过理想的洗练泡制，改造成的。故理想乃主义的最要部分。一种主张能成主义与否，也全靠这点。

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进行趋向或是态度。一种主张能成为标准趋向态度，与具体的方法却成反比例，（因为愈具体各部分利害愈不一致）全看他所含抱的理想的强弱。设个比方：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航海的人，照着他进行罢了。至于航海的方法，以及器具，却是另一件事，与他无必然的关系。故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其间虽有联属的关系，却不是必然不可分离的。一个主义，可以有种种的实行方法，甚至可以互相冲突，绝不相容。各种的实行方法，也都是按着各部分人的利害必要，各各不同。因为方法与主义，不过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向着这目标走，果然是一定不变；至于从那一条路走，路中所遇事物何如，行路中间所起的事变何如，与这目标并无必然的关系。换一句话讲，主义并不一定含着实行的方法，那实行的方法，也并不是一定要从主义中推演出来的。故所以同一主义，在甲地成了某种现象，在乙地又成一种现象。乃同在一地。信奉同一主义的人，因实行方法的不同，变成种种极不相容的党派。这种例证，古今不知多少，亦不用再举的了。

胡君说，主义的弱点和危险，都在这抽象一点上：这话也不尽然。吾上文已经说过，范围愈广，他的抽象性亦愈大。因为抽象性大，涵盖力可以增大。涵盖力大，归依的人数自然愈增多。

自来宗教上，道德上，政治上，主义能鼓动一世，发生极大效力，都因为他能涵盖一切，做各部分人的共同趋向的缘故。若愈近具体，则必切合一部分的利害。他的发动的力量，顶大也只限于一部分的人，如何能鼓动各部分的人呢？故往往有一种主义，在主义进行的时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团结也非常坚强；一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主张纷歧，立刻成一种扰攘的现象。像那法国大革命，中国辛亥的革命，以及今日的俄德革命，都是极好的一个例。他们当初所以能成功，都因为共同奉着一个抽象主义。若是起初就拿具体的方法来进行，恐怕在

革命前，便已互相冲突纷乱扰攘，早为旧势力所扑灭，还能等到革命后来纷扰么？

胡君说主义有危险。依吾的意见，主义的自身并没有什么危险。所谓危险，都在贯彻主义的实行方法。何以故呢？因为凡是主义，必定含着一种未来的理想。在尚未实现的时候，如何能判定他危险不危险呢？若指他试验中间所发生的种种恶现象而言，则凡属试验的事物，必须经过种种错误，才能成功，——所谓错误，也只方法上的错误，——不独主义为然。况且主义不过是一种标准趋向态度，并非实行方法。在同一主义之下，可以有种种不同或是相反的方法。危险不危险，全看选择的精确不精确。择术不精，才有危险。如何能怪及主义呢？比如罗盘针虽是航海的趋向标准；但同一方向的海路，本不只一条，海中间所有的危险，也不只一途；你自测量不精，走错了路，如何能怪及罗盘针指示的方向不对呢？故说主义危险，实是因果倒置。……

照吾以上说法，问题与主义，并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现在且把问题主义方法三种相连的关系，归结到下列五点。

（一）一种问题的实行方法，本有种种条款，有重要的，有不重要的，有联属的，有矛盾的。若无一贯的精神把他整齐贯串，如何能实行有效呢？这种一贯的精神，就是主义。故说主义是方法的标准趋向和态度。

（二）问题愈大，性质愈复杂。一个问题，往往含有无数相反的可能性。其中自有最重要而为问题的中心一点。这最重要而为中心一点，在问题自身，原为解决方法的标准，抽象出来，推行到他部分或是他种问题去，即是主义。

（三）问题的抽象性，涵盖性，很有与主义相类的地方。往往同一事件，从受动这方面去看，是个问题，从能动这方面去看，就是主义。换一句话讲，问题有一贯的中心，是问题之中有主义；主义常待研究解决，是主义之中有问题；二者自不能截然区别的。

（四）社会的环境不同，主义和问题的关系，也就不能一样。在文化运动进步不息的社会，主义常由问题而产生。因为在这种社会，一切事物，都属能动性，常跟时代前进。偶有那不进的事物，立刻便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成为问题。有问题，便发生各种运动。从这运动中，便产生了若干主义，拿来做解决方法的实行标准。若是在那文化不进步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成了固定性的习惯，则新问题的发生，须待主义的鼓吹成功，才能引人注意。因为这种社会，问题的发生，极不容易。非有一种强有力的主义鼓吹成熟，征服了旧习惯，则无论何种事物，都有一个天经地义的因袭势力支配在那里，若有敢挟丝毫疑义的人，便是大逆不道。如何能拿来当一个问题，去讲求解决方法呢？故在不进步的社会，问题是全靠主义制造成的。

（五）不论何种社会，凡是进到何种程度，文化必定渐渐化为固定性，发生停滞的现象。故必常常有少数天才有识的人，起来鼓吹新理想，促进社会的文化；这种新理想，在一般人渐渐首肯之时，即成为主义。由此主义，发生种种问题，试验又试验，常悬为未来的进行方针。而在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自身不能发生新理想，则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

以上五点，即是吾上文所说的结论。胡君对于主义，于吾上文所说外，尚抱有几个疑点。现请就这几点上讨论。

（一）空谈主义，是很容易的事，解决问题是很难的事。难易本来是比较的话，没有绝对的标准。……比如主义，读一二小册子，便可乱谈，看起来似乎很易。但是要把一种主义的内容和意义，明白得十分透澈鼓吹到社会上去，使社会的若干部分，成为信徒，发生主义

的运动,这事恐怕就很难。又如解决实际问题,往往费尽力量,不得一个圆满的结果,看起来似乎很难。但若不问结果,只要糊里糊涂了结,那了结的方法,正容易呢!可见主义的易,不易在主义本身,而在随便乱谈;问题的难,不难在解决方法,而难在解决后的好结果。再进一步言:解决的结果何以有好坏,好结果何以很难,这不可不有一判别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一种主义。……胡君不说应当从主义上做工夫,却教吾们去想实际解决的方法,那自然是难极的了。

(二)胡君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君的意思,以为一切主义,都不过是某时某地一种具体的方法转变来的,和吾们实际的需要未必能符;各有各的需要,各有各的方法;故说外来的主义是无用的。这话果然也很有道理。但是在今日世界,文化交通的时代,各社会的需要,渐渐日即日近,一地有效的主义,在他地也未必无效。吾们只能问主义之有效与否,不必问他是外来的或是自生的。况且所谓实际需要,也得有个解说。在因袭势力支配的旧社会,他的需要和那文化进步的社会,都是大不相同的。……中国今日所有的新需要,新问题,那一件不是外来的思想主义所产出来的么?如果胡君的话是专指不合现时用的那些极端主义而言,命题果然正确的多;但是亦有未尽然的地方。因为一切主义,都含有几种理想,其中有现时可适用的,有现时不可适用的;甲地可适用的,乙地不可适用的;极端的如是,温和的亦复如是;这是选择应用上的问题,和输入外来的主义无关。即如过激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等,其中不适合的地方,果然很多,有益处的地方也并非绝无。取长去短,以补他种主义之不足,亦未尝无效力可言。要在能否运行。研究他亦正不妨。若是概括以空谈外来主义为无用,未免有几分独断。

(三)胡君说偏向纸上的主义,有为无耻政客用来做害人的危险。胡君这种忧虑,是大可不必有的。因为主义进于鼓吹,已不限于纸上的了。人家受他的鼓吹,信奉他的主义,必定要问这种主义的内容和他的影响结果。无耻政客,决不能用来欺人的。……王揖唐讲社会主义,依然还是一个王揖唐主义,绝没有人去上他当的。至于假借名目,用来作陷害人的器具,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没有这些主义的时候,他们何尝少害了人呢?横竖吾们是他们眼中钉,有主义也罢,无主义也罢,总有一天拔去了他们才痛快。倒是吾们现时在研究商酌之中,不能自己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标明旗帜,和他们短兵相接,是一件最抱憾的事罢。

吾现在再简单总刮几句话:吾们因为要解决从人力车夫的生计,到大总统的权限;从卖淫到卖官卖国;从解散安福部到加入国际联盟;从女子解放到男子解放等等问题;所以要研究种种主义。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

(原载《每周评论》三三期 一九一九年八月三日)

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

陈 独 秀

上海《时事新报》上所载PR君那篇“世界改造原理”,简直是梦话,简直是渔猎社会以前之人所说的。人类自有二人以上之结合以来,渐渐社会的发达至于今日,试问物质上精神上那一点不是社会底产物?那一点是纯粹的个人的?我们常常有一种特别的见解和一时的嗜好,

自以为是个性的，自以为是反社会的，其实都是直接间接受了环境无数的命令才发生出来的，认贼作子我们那能够知道！即如P·R君所谓“不听命于人”之理想，当真是他个人的理想，绝对未曾听命于人吗？不但个人不能够自己自由解放，就是一团体也不能够自由解放，福利耶以来之新村运动及中国工读互助团便因此失败了。不但一团体不能够自由解放，就是一国家也不能够自由解放，罗素先生所以说俄罗斯单独改革有点危险。不但物质上如此，精神上也是如此。比如妇女殉夫他自以为个人道德是应该如此的，又如我们生在这资本制度社会里的人，有几个人免了掠夺底罪恶，这种可怕的罪恶是个人能够自由解放的吗？除了逃到深山和社会完全隔绝，决没有个人存在之余地，我所以说P·R那篇文章是梦话，是渔猎社会以前之人所说的。

至于他反对一切建立一个主义的改造，我试问他反对一切建立一个主义，是否也是一种主义？他主张个人物质的及精神的方面完全解放以后再改造，是否也是一种主义？他所希望的人人各得其所的理想世界，他所希望的干干净净的人生，是否也是一种主义？我们若是听命于他的这种无信仰无归宿之改造，是否也要“深入一层地狱不能自由超拔的反于本来大路上去”，是否也是“人类听命于人的改造”方法，是否也要“弄得非常紊乱无限苦脑，造罪作恶总不了悟”呢？

我们中国学术文化不发达，就坏在老子以来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现在我们万万不可再提议这些来遗害青年了。因为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非把社会回转到人时代不可实现。我们现在的至急需要，是在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虚无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都是叫我们空想，颓唐，紊乱，堕落，复古。

（选自《独秀文存》二卷、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主 义 与 努 力

陈 独 秀

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

我看见有许多青年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因此我曾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椿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又曾说：“无论在何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像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这些话本是专为空谈主义不去努力实行的人而发的，比如船夫只定方向不努力，船如何行得，如何达到方向所在。

但现在有一班妄人误会了我的意思，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

我敢说，改造社会和行船一样，定方向与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这话真是不错。

（选自《独秀文存》二卷）

主 义 与 时 代

力 子

无论何种主义，都是时代底产儿。凡提倡某种主义，或为某种主义鼓吹，而能使社会蒙其影响的，必此主义能适应时代的底潮流。反之，与时代潮流相抗，而强欲遏抑某种主义的，在政治方面，徒然激起扰乱，在言论方面，也是徒乱人意。

现在的思潮界，社会主义已有弥漫一时的现象，这决非单为好奇喜新的心里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种主义的征兆。却不料在这个时候，还有人拿他个人为好奇喜新而主张社会主义的心理，来推测一切人们，以为都是和他一样的，便硬说社会主义在“现在”决不需要，只可待之“将来”。我敢断言：他于社会主义底历史和性质固然不能明瞭，就是他底时代观念也已十分错误。

现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可分两种：一种是认定社会主义为有危险性质，看做洪水一般，不想疏导而想湮塞。这一种愚而无知，我且不去说渠。又一种是并不敢反对社会主义底本身，只说社会主义必应用于产业十分发达以后，中国现在还没有这样程度。这一种似是而非，必须加以辨明。

世界上有劳动者，即随时有劳动问题。中国古时已有近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不均不安底害，随时显著，本不必定要在近代产业制度底下面，才有社会主义底主张。但反对者必以为社会主义是从外国来的，不能用中国底旧话来附会，——我也不主张附会——一定要拿中外实业界底形势来比较。姑不论中国底新实业近时已产生不少，象开滦煤矿工人问题早引起公众底注意，我更有一最简单明瞭的质问，就是：

中国实业固不能和现在欧美各国相比，但比之百年以前和数十年以前的欧美各国究竟如何？

欧洲产业革命，也是在十八世纪之末才有的。并且在十九世纪底前半期，除了英国以外，象法国，德国，也都在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之中。可是社会主义底学者，都早在那时奋起了，法国底圣西门 Saint-Simon 和富利安 Charlier Fourier，都在千八百二十年以前，著述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并实施社会主义的运动。英国底欧文 Robert Owen 也和他们同时。德国社会主义底首领拉塞尔 Ferdinand Lassalle 因格尔斯 Friedrich Engels 马克思 Karl Marx 等，也都在德意志统一以前早实行社会活动。就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也还是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公布的。俄国在这次大革命以前，没人不说彼产业幼稚，可是社会主义底运动并不因此稍沮。他们都是在机械工业开始发展时候，看见那些工厂中底惨酷境遇，便一刻不能再忍，要拯救那些可怜的劳工。现在中国底产业虽未振兴，但机械工业何尝全无萌芽？开滦煤矿工人数百人同时惨死的激刺，难道还不足触发学者底良心吗！

主张的可贵，正在能疏导时代底潮流，不待横溢而后防堵。欧西底先觉者，都在产业革命初见弊端之时，即已热心改革，却因响应者太少，以至流弊至今为甚。我们现在底情势，至少也和欧西百年前相同，又已有覆辙在前，还要说“以待将来”，真甘心 and 时代潮流相抗了。

（原载《觉悟》，一九二〇、十二、二一）

论 是 非

霆 声

一 古 今 中 外 新 旧 之 争

有一等人说：古时候的一切旧东西都是好的，到如今，所有一切便都渐渐的变坏了。古时候的旧文章是朗朗可诵的，如今新的便不堪入耳了。古时候的旧礼教是上下有序的，如今新的便尊卑不分了。古时候的旧风俗是有谦谦之德的，如今新的便各不相让了。古时候的旧生活是超然物外的，如今新的便惟利是趋了。总之，古时候都好的，如今便都坏了。甚至古人寿长，今人寿短了。古时米贱，如今米贵了。古时兄弟对哥哥叩首，如今儿子也只对父亲鞠躬了。说不尽的古时候的好处啊！

又有一等人说：中国的没有一样是好的，是好的一齐都在外国，所以要好的不能不到外国去找。比如：中国的古人是一些学也禄在其中矣的官迷，外国的古人都是思想超绝的哲人。中国的旧书祇是骸骨的牢狱，外国的旧书都是必读的经典。中国的拳棒是好勇斗狠的由来，外国的武术是强身健种的根原。中国固有的讽刺是文人相轻，外国传来的讽刺是有趣的幽默。中国式的缠足是不人道，外国式的高跟鞋乃是美观。总之，是中国的都应该澈底排斥，是外来的便应该全盘承受。

以上的两等人和他们的正反对党从有了所谓新文化革新运动以来，便气愤愤地，各不相容的争论起来了。一边骂一边是醉心欧化的洋奴，一边笑一边是头脑硬化的老顽固。一边自诩为保存国粹的功臣，一边自命为改革思想的前峰。一边说：要中国好，除非不读中国书；一边说：要中国好，除非恢复古文化。一边说：照了你的办法，势非回到原始时代不可；一边说：依了你的主张，中国人只好做人的奴隶了。

这绝对的两方，各自抱了一张百石弓，自以为可以趁心由意的射死他的一切敌人，殊不知自己弓上的弦，早已寸寸断了。

本来，象这样的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就算是说的有理，也只是公婆的理，那里能概括儿子媳妇孙子重孙在内呢？

我以为：我们批评一样东西的好坏，一定要先抛去成见。所以我虽赞成我们拿一切东西来批评他的好坏，但我反对拿古今中外新旧等等时间和地位的区别来作批评好坏的标准。一个时候的东西可以有好的，但也可以有坏的。一个地方的东西也是如此。为了那时候有了些好的便把同时的坏东西也取了来，为了那地方有了些坏的便把同地的好东西也拒绝了去，都不是我们所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只须问清一样东西本身究竟是好是坏，我们万不可把自己的眼光收到狭隘的“成见”圈子里去了武断一切。

只有好的才是好的，只有坏的才是坏的，只有好坏统可以作批评好坏的标准。那些武断的尊古，崇洋，排新，斥旧的人们哟，请不要因一时的意气便把是非黑白都颠倒了罢！

二 主义与主义者

自从什么什么的主义喧腾于报章杂志的上面，通儒硕学的口中之后，什么什么的主义者便多如寒空中聒噪的老鸦；——从上至下，从南至北，几乎不是主义者便失了做人的资格一般——在暗灰色的背景下，他们哇呀哇呀地满天飞着，撒下了一地白屎。

一个人是不是定该信奉一种主义，定该成为一种主义者，这全是各人的自由和愿心，谁也不能加以干涉；浅学如我，更何敢妄加论断？至于那种主义好，那种主义坏，则题目更为高大，我这个非主义者，实也没有来细细加以评衡的精力和闲暇。现在我在这个题目中所要说的，只是我们对于主义和主义者应取的态度的小小问题而已。

我先要说一说主义和主义者的关系。

谁都知道信奉某一种主义的便是某一种主义者。信奉国家主义的叫国家主义者，信奉帝国主义的叫帝国主义者，信奉共产主义的有共产派，信奉三民主义的有国民党，信奉佛教的有秃头大和尚。主义与主义者的关系是很为显然的，何用着我来多讲？

可是，如寒鸦一般多的主义者中，真正是信仰奉行某种主义的信徒，实在并没有那般以主义为招牌的“贾维新”那么多。贾维新们掙了主义的招牌是另有作用的，所以，主义者对于主义到底是怎么一种关系就很难说了。

仅仅以主义者的言行来作为评衡主义的凭藉的那般态度十分武断的批评家，在这种冒牌的主义者满天哇呀哇呀地飞叫着的时候，便不免常常有把是非混淆的错误发生。

即是真正信奉主义的主义者，他的言行仍不免被个人的情感和习惯支配着而往往有非主义中所应有的状态；比如一个热心奉行国家主义的青年而恰有酒癖的，我们决不能因此便武断说：国家主义是提倡饮酒的；同样，主义者的个人甚至是就是多数人的言行，并不就是主义本身的所有物。这一点在思想混乱的我国是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许多歹人和鄙夫正在掙了主义的招牌到处造谣生事的时候。

最近我们常常看到不同的主义者互相咒骂，互相攻击，例如醒狮派和共产党，他们的视点便多谬误如我以上所述：他们互相摭拾一些主义者的个人言行来咒骂，来攻击主义的本身。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是不能研究主义本身的是非，还是有意颠倒黑白来欺骗局外人？

总之，在各种主义并列的现代，我们不能不郑重我们的态度；我们在一种主义还未曾澈底知道之前，决不宜轻加论断，如那般时下的冒牌主义者的无理举动一般，徒为识者所笑。

末了，我要说一说我所希望的主义和主义者的几个根本条件：

第一，我们所要的主义的精神至少要不反时代精神的，要不拥护旧有恶势力的，要不为统治阶级张目的，要不把人民全体分割的。

第二，我们所要的主义者的态度应该是研究的而不是迷信的，应该是真诚的而不是假借的，应该是实地去做而不是随口空喊的。

（原载《洪水》一卷，一九二五年八月九日）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①

胡 适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经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报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实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实社会的需要麻？”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

^① 注：本集收入胡适关于“问题和主义”三篇文章均选自《胡适文存》一集二册